

国学新读本

文心雕龙

刘勰 著
戚良德 注说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国 学 新 读 本

文 心 雕 龙

刘 勰 著
戚良德 注说

河 南 大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心雕龙/刘勰著;戚良德注说.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3

(国学新读本)

ISBN 978-7-81091-739-1

I. 文… II. ①刘… ②戚… III. ①文学理论—中国—南北朝时代 ②文心雕龙—注释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2876 号

责任编辑 朱建伟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 475001

电话: 0378-2825001 (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排 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mm × 960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289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41.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国学新读本编辑委员会

总策划 马小泉

主 编 李振宏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小泉 王 健 朱绍侯 刘小敏

李中华 李振宏 苏凤捷 何晓明

张云鹏 张富祥 宋会群 杨天宇

杨寄林 杨朝明 赵国华 郑慧生

姜建设 袁喜生 曹 峰 曹础基

曾振宇 戚良德 龚留柱 熊铁基

序

最近一些年来,一股“国学热”的思潮强劲涌动,在文化学界以至于整个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大变革时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最为传统的国学,却能引起国人的极大兴趣,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国学”作为一个学术文化概念,产生于近代。从渊源上讲,“国学”概念的产生,与“国粹”有些关联,并且是从对抗西学侵入的角度提出来的。今天,中华民族早已是一个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立自强的民族,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世界文化的汇合与交融,也早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在这样的历史大势中,却会有“国学热”的产生,乍一看来,确有不可思议之处。但实际上,国学的当代走红,则与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时代有着一定的关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迅速推进,随着市场经济的强劲发展,传统道德受到了强烈冲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观念的碰撞也日益强烈。于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就严峻地提到了国人的面前。传统文化的出路何在,它从何而来,要走向何方,如何对之进行价值重估,一切关心文化问题,有着强烈历史责任感的人们,无不把关

注的目光投向中国的传统学术。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冲击无法理解和接受,对现代经济发展对传统道德的亵渎强烈抗议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发出向传统文化复归而倡导国学的呼声。总之,不论是出于积极的思考,还是抱着一种向后看的心态,对国学的重视则成了最近十多年来一种普遍的文化选择。

于是,对待“国学热”就需要有一个分析的态度。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来说,传统文化都是其牢固的根基,是其一切历史的出发点,摒弃传统、甚至全盘否定传统文化,都是幼稚可笑的,不可取的。但一遇到问题就求助于传统,甚至一味狂热地提倡向传统复归,也是走不通的,过去那句常说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话,虽说不是什么至理名言,却也还是有些道理的。这些年来,一些地方出现的中小學生、甚至幼儿园小朋友的读经热,就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国学,毕竟是一种学术,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有一定的分析批判能力,才能对之进行识读、鉴别而决定其取舍。所以,严格地说,对于国学,尤其是经学,在当代中国,需要的是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批判继承,而不是再像传统社会中那样采取唱诗班的方式,对青少年一代进行无分析地灌输。因此,如何弘扬传统文化,就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为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为着对社会上盲目崇尚读经的风气有所引导,我们组织了这套“国学新读本”丛书,选择一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较大的国学典籍,对之进行简明扼要的注释,然后在读本前边,用较大篇幅解读该典籍的基本思想文化内涵,评述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并对如何阅读该典籍做出读书方法上的引导。通过这样一个较为翔实的导读内容,以批判分析的态度,给青年人的国学典籍阅读提供一个健康的思想导向。根据这样的宗旨,这套丛书,在大的结构上,每

本都分为通说和简注两个部分,通说是导读的性质,简注在于疏通文字,希望这样的安排,能够为青年朋友和一般社会读者提供一个国学入门的向导。果能如此,也就实现了撰著者和出版者的愿望。

国学所以是国学,就在于它是我们祖国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载体。在这些国学典籍中,包含着民族文化的基因,蕴藏着民族精神的范型。衷心期待这套丛书能够成为广大读者学习国学精华,体认民族精神,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良师益友。

李振宏

2008年2月28日

目 录

序	李振宏 (1)
《文心雕龙》通说	(1)
原道第一	(69)
征圣第二	(74)
宗经第三	(78)
正纬第四	(84)
辨骚第五	(89)
明诗第六	(95)
乐府第七	(102)
诠赋第八	(109)
颂赞第九	(114)
祝盟第十	(120)
铭箴第十一	(126)
诔碑第十二	(132)
哀吊第十三	(138)
杂文第十四	(143)

谐隐第十五	(148)
史传第十六	(153)
诸子第十七	(163)
论说第十八	(169)
诏策第十九	(177)
檄移第二十	(184)
封禅第二十一	(189)
章表第二十二	(194)
奏启第二十三	(200)
议对第二十四	(207)
书记第二十五	(214)
神思第二十六	(224)
体性第二十七	(229)
风骨第二十八	(233)
通变第二十九	(237)
定势第三十	(241)
情采第三十一	(246)
镕裁第三十二	(250)
声律第三十三	(254)
章句第三十四	(259)
丽辞第三十五	(263)
比兴第三十六	(267)
夸饰第三十七	(271)
事类第三十八	(275)
练字第三十九	(281)

隐秀第四十	(287)
指瑕第四十一	(290)
养气第四十二	(295)
附会第四十三	(299)
总术第四十四	(304)
时序第四十五	(308)
物色第四十六	(319)
才略第四十七	(324)
知音第四十八	(334)
程器第四十九	(340)
序志第五十	(345)
参考文献	(351)

《文心雕龙》通说

一 刘勰的生平与著述

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东晋时，莒县已沦陷，晋明帝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侨置南东莞郡，刘勰祖、父即居于此。刘勰大约生于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年）。其祖父刘灵真，除了《梁书·刘勰传》提到乃“宋司空秀之弟也”以外，不见于史传记载。刘秀之是司徒刘穆之的从兄子，官位司空，仅次于丞相。刘穆之则是汉齐悼惠王刘肥之后，刘肥乃高祖刘邦长庶男。如此以来，刘勰祖上便可追溯至汉高祖刘邦，自然是颇为显赫的。但许多研究者指出，《梁书·刘勰传》的这句话是不可靠的，正因如此，《南史·刘勰传》就将其删掉了。另外，《南史》以家传为体例，以同宗同族者合为一传，其中穆之、秀之一宗并无刘灵真等人；且秀之、粹之兄弟皆以“之”字为名，不大可能有一个名为“灵真”的弟弟。据此，研究者一般认定刘勰乃出身贫寒庶族。但对《梁书》本传的这句话以及《南史》的删节，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对刘勰的出身也就有着不同的解释。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说，自己七岁之时，梦见一片五彩祥云，犹如锦缎般美丽，便“攀而采之”。然而不久，刘勰的父亲

刘尚便去世,无疑打碎了刘勰的美梦。《梁书·刘勰传》说:“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大约在刘勰二十岁左右,母亲又去世了。守孝三年以后,刘勰来到京师,举步踏入了钟山名刹定林寺。《梁书·刘勰传》这样记载:“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所藏,勰所定也。”这句简单的“积十余年”,意味着刘勰几乎全部的青春时光都是在定林寺度过的;而沙门僧祐则成为这一时期刘勰生活中关系最为密切的人。僧祐乃佛家律学名僧,刘勰跟随其十余年,所受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作为僧祐的得力助手,刘勰帮助其大规模地整理佛经。厘定文献,区别部类,造立经藏,撰制经录,“或专日遗餐,或通夜继烛;短力共尺波争驰,浅识与寸阴竞晷”(僧祐《法集总目序》),最终“博通经论”,成为佛学的专家。正是在这一时期,刘勰写下了一篇重要的佛学论文《灭惑论》。

齐明帝建武五年(498年)前后,已逾而立之年的刘勰又做了一个美梦。他梦见自己手捧红色的祭器,跟随孔子向南走。梦醒以后,他感到非常高兴。遥想夫子当年,尚且慨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而今,他老人家竟然托梦于自己这个无名小卒,这难道不是重任在肩吗?于是,刘勰“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序志》)。根据牟世金先生比较精确的推断,从建武五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502年)三月(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巴蜀书社1988年,第50-54页),刘勰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以大约四载的光阴,全力结撰自己的论文之作。呕心沥血四个春秋,刘勰在定林寺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光辉夺目的一章,并为这一精彩的华章定下一个动听千古的美名:《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书成之时,正值齐梁禅代之际。刘勰身居定林十余载,却一直是白衣之身;既不愿出家为僧,则长此以往又怎能甘心呢?回首岁月,已历宋、齐、梁三朝;屈指青春,则近不惑之年。

其人生之路通向何方,已是摆在面前的迫切问题。刘勰自然期望《文心雕龙》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新开端,而不是像司马迁那样准备“藏之名山”。可是,以自己无名小辈,又久居寺门之内,纵有旷世惊人之作,又怎能得到世人之肯定和承认呢?于是,刘勰想到了沈约,一个历仕宋、齐、梁三朝并成为当朝权贵、而又身兼文坛领袖的人。

《梁书·刘勰传》是这样记载的:“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千载之下看来,这实在是颇富戏剧性也颇有喜剧性的一幕;然而不难想见,刘勰迈出这一步,实在需要很大的勇气,甚至要承受不少痛苦的折磨。不过,事情出人意外的顺利。《梁书·刘勰传》云:“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沈约无愧为一代文坛领袖。其“便命取读”的态度显示了他的贵而无骄,其“大重之”的激赏证明了他奖掖后进之无私,其“深得文理”的评价说明了他的目光深邃,而其“常陈诸几案”的举动则尤属难能可贵。

梁武帝天监二年(503年)前后,刘勰“起家奉朝请”(《梁书·刘勰传》)。“奉朝请”者,奉朝会请召而已,既不为官,亦无任职;但既已“奉朝请”,则正式踏上仕途便指日可待。第二年正月,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晋号中军将军;其开府置佐,网罗幕僚,刘勰有幸成为他的记室。记室之位虽然不高,然其专掌文翰,职务乃是颇为重要的。刘勰一入仕途便成为梁武帝之弟萧宏府中记室而居枢要之职,可谓幸运了。一年以后,刘勰转为车骑将军夏侯详的仓曹参军。此次改任,并非职务的升迁,不过夏侯详德高望重,其车骑将军之位亦高于中军将军,这对刘勰而言,自然是值得欣慰的。天监六年(507年)六月,夏侯详被征为侍中、右光禄大夫,刘勰亦离开仓曹之职,出为太末(今浙江龙游)令,走上治理一方的为官之路。《梁书·刘勰传》特地记载了刘勰治理太末的结果:“政有清

绩。”文字可谓简略之至,但作为父母官,没有比为官的清明和清廉更重要的了。

刘勰任太末令三年期满以后,被任命为仁威南康王萧绩的记室,兼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萧绩乃梁武帝第四子,聪警异常,梁武帝爱之有加;所以简拔刘勰为其记室,乃是莫大的优渥。更为重要的是,刘勰同时成为东宫之主、太子萧统的通事舍人,则其受到梁武帝的信任,是显然可见的。若以职位而论,东宫通事舍人之职位列末班,官品固低;但东宫官属的选拔,或以出身世家大族而声名清要,或以才华出色而众望所归,其严格谨慎,是一般职位所不能比拟的。

关于刘勰和萧统的关系,《梁书·刘勰传》只有这样一句话:“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刘勰以知天命之年而奉事萧统,且有“深得文理”的《文心雕龙》名世,其深得“爱接”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不少研究者也有这样一个疑问:所谓“昭明太子好文学”决非虚言,不仅他为后世留下的一部《文选》可以作证,而且其“爱接”文士的种种具体情况,史书亦多有记载;何以身为他的通事舍人的刘勰,除了一句泛泛的“深爱接之”,就再也找不到其他有关的记述了呢?

据笔者的揣测,萧统以对“文学”的爱好而对刘勰青眼有加,彦和本人却未必引以为幸事。文章之于刘勰,固然是立身之本,甚至可以说,没有呕心沥血的《文心雕龙》,就不会有他的仕途生涯;然而,所谓“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所谓“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程器》),刘勰的人生目标决非只是一个文人;其所以跻身仕途,也决非以一个御用文人为满足。正是在这里,萧统与刘勰就有了巨大的差异。以太子之位,天下迟早运于掌上,军国大政反而变成平常之事;对文学的爱好和重视,既是题中应有之义,更属锦上添花,自然无可非议。而对刘勰来说,如果仅仅以“文学”

而受到太子的“爱接”，随其游宴雅集，随其制韵赋诗，或者为其《文选》的编纂出谋划策，从而混同东宫众多的文士，那么，离其人生目标可就相去远矣！

事实也证明，刘勰考虑的问题并非文学之事。《梁书·刘勰传》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天监十六年（517年）四月，隆佛正盛的梁武帝曾下诏，要求天子宗庙的祭祀品不能再用牺牲（家畜），因其与佛家不杀生之旨不合；至十月，梁武帝再次下诏，因为宗庙祭祀虽已不再用牺牲，但还有干肉一类的东西，诏书要求改用蔬果。这就是所谓“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不过，梁武帝的两次下诏，皆引起“公卿异议，朝野喧器”（《南史·梁本纪上》），甚至有不服从诏命者；而祭祀天地社稷之神的郊社之祀，仍然使用牺牲。这便是刘勰上表的用意了，他认为既然天子七庙之祭祀已经改用蔬果，二郊农社之祭祀亦当与七庙相同。

显然，刘勰的表奏是符合梁武帝之意的。天监十七年（518年），五十二岁的刘勰升迁步兵校尉，仍兼东宫通事舍人。步兵校尉职掌东宫警卫，位列六品；较之属于九品的通事舍人，无疑是连升三级了。历任此职者，皆士林名流，则刘勰之迁任，既为荣升，更是殊遇。所以此时的刘勰，可谓一生中最为幸运和辉煌的时期了。

然而，当刘勰艰苦奋斗、孜孜以求数十载，终于看到希望的曙光之时，这扇希望的大门却又缓缓关闭了。天监十八年（519年）四月，梁武帝于无碍殿亲受佛戒，法名冠达，从而掀起崇佛的高潮，刘勰亦接到诏令：解除步兵校尉之职，与慧震和尚一起，回定林寺编纂经藏。其实，正值梁武帝隆佛之时，把编集经藏的任务交给刘勰，算得上信任之举。而且，此时僧祐去世不久，令刘勰回到定林寺整理佛经，也是合乎情理之事。然而，这对升任步兵校尉之职刚

满一年的刘勰来说,不能不说是相当残酷的。

可以想见,回归定林之路是漫长而又无奈的。遥想三十年前,当刘勰初次踏上定林寺的石阶时,虽同样是无可奈何,甚至是走投无路,但并没有失去希望;他身居佛寺十几年却并未剃度出家,正是坚信总有一天会走出佛门,走上辅时报国的人生通衢。未曾料到的是,三十年后竟重返定林寺!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望着定林寺熟悉的僧房,刘勰又当作何感想呢?

对刘勰来说,整理、编订经藏的任务可谓轻车熟路,用不了太长的时间。但是完成任务以后呢?细思萧梁王朝对他的态度,刘勰不能不感到与其希望实在是相去甚远。太子萧统的“爱接”有加当然并非虚情,然而如上所述,在太子的眼中,刘勰似乎只是一个文人;或者说,其文士的身份更令萧统感兴趣;太子优礼以待者,正因其文才。与太子一起谈文论诗,甚至助其编辑《文选》,当然也是一些文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但却决非彦和所愿。梁武帝对他的注意似乎与萧统有所不同,但也显然并未着眼军国大政而予以安排任用。在隆佛至极的梁武帝的心目中,东宫步兵校尉之职是远不如整理佛经重要的,这就是刘勰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从熙熙攘攘的俗世再次沉潜佛国,我们难以揣度刘勰的心境发生了怎样的巨大变化,但这种变化显然是存在的。他也许终于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佛,理解了人们为什么要出家,理解了那永不疲倦的暮鼓晨钟的真正含义。他也许有一种终于参透世事的大彻大悟,但不知他是否会有觉今是而昨非的痛悔?所谓“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程器》),看来“纬军国”、“任栋梁”的“奉时骋绩”之梦最终是不可能实现了,然而“独善其身”之路,除了“垂文”,更彻底的自然是出家为僧。梁武帝普通二年(521年),完成整理佛经任务之后的刘勰上表“启求出家”(《梁书·刘勰传》)。他先用火烧掉了两鬓之发,

以表明自己出家之念已不可动摇。其实,梁武帝自己都能“舍身事佛”,何况他人?刘勰终于穿上缁衣,改名慧地,皈依佛门。出家不到一年时间,刘勰即辞别人世,享年五十六岁。

关于刘勰的卒年,尚有种种不同意见,如李庆甲先生考定:“刘勰,这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杰出的理论家,他的生年当是公元465年左右,他的卒年是公元532年,总共活了六十七、八岁。”(李庆甲《文心识隅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页)新版《辞海》就采纳了李庆甲先生的意见。实际上,由于资料的缺乏,关于刘勰生平许多问题,都尚无定论而需要进一步探讨。

现存刘勰的著作,除了《文心雕龙》以外,可以肯定的尚有《灭惑论》和《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两篇。前者近三千字,是一篇佛学论文;后者二千三百余字,是一篇碑文。除此之外,中古时期近三万字的《刘子》一书,也有学者认为是刘勰的著作,这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二 《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

《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其结构经过精心安排而部伍严整,其理论观点之间讲究次序而回环照应、互相补充而逻辑严密,形成一个完整、精密的系统。在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史上,具有如此完整、系统而庞大的理论体系的著作,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下面我们即对这一体系作简要介绍。

(一) 《文心雕龙》的枢纽论

《序志》有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这段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就《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而言,乃是以道为根本、以圣人为老师、